

服务与教育功能并重:新加坡课后服务探析

张慧之

(上海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上海 200234)

摘要: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新加坡逐渐形成了服务与教育功能并重的课后服务体系。基于学生关爱中心和课程辅助活动两大品牌,新加坡课后服务呈现出供给主体多元化、内容形式多样化、师资培养差异化的实践特征。基于此,新加坡经验可为“双减”背景下我国课后服务发展提供启示:要完善政府主导、多元协同的育人机制,推进课后服务课程化建设,优化课后服务师资队伍。

关键词:课后服务;新加坡经验;“双减”

伴随着“双减”政策的实施,课后服务成为学校的重要责任,但是我国义务教育学校课后服务尚处于探索阶段,呈现国家政策短时间内调整较大、地方政策细则差异显著的特征。^①受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影响,部分学校认为课后服务的政策和经费支持不足,又增加学校负担,因此采取“表面化”“片面化”的应付行为。^②而且,难以保障参与课后服务的教师的专业化水平,校内外教师的合作存在诸多问题。^③此外,课后服务课程内容单一、体系缺乏,不能满足学生个性化需求与针对性育人的功能^④,而悄然兴起的隐形学科培训与回归教育原点、指向儿童生命成长的育人目标背道而驰。因此,课后服务的价值重构与质量提升是当前亟待思考的课题。

新加坡与我国同为儒家文化影响下的亚洲国家,都面临家庭少子化趋势、教育需求复杂多元等相似的挑战,新加坡课后服务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经验,可为我国课后服务的发展提供借鉴和启示。

一、新加坡课后服务的发展历程

1. 兴起阶段(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以基础保障为重点,关注弱势群体

20世纪70年代,随着新加坡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男女平等观念的普及,越来越多的双职工家庭和单亲家庭出现儿童看护难题。这一时期,新加坡“挂钥匙儿童”(latchkey children)的比例显著上升。^⑤研究人员认为“挂钥匙儿童”课后自我看

作者简介:张慧之,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师范大学党委统战部讲师,主要从事教育学原理研究。

① 杨清溪,邬志辉:《义务教育学校课后服务落地难的堵点及其疏通对策》,《教育发展研究》2021年第41期,第42-49页。

② 邓亮,周莉琳:《多重制度逻辑下我国课后服务政策执行困境及其治理》,《现代基础教育研究》2021年第4期,第103-109页。

③ 康丽颖:《促进儿童成长:课后服务多元主体协同育人探讨》,《中国教育学刊》2020年第3期,第22-26页。

④ 李宝庆,纪品:《“双减”背景下高质量课后服务课程建设的创新路径》,《课程·教材·教法》2022年第11期,第65-73页。

⑤ Goh Yan Han, Caring for “Latchkey” Kids over the Decades, 载 <https://www.straitstimes.com/singapore/caring-for-latchkey-kids-over-the-decades>, 最后登录日期:2023年5月21日。

护并非毫无益处^①，但是学龄儿童放学后长期处于“监管真空”状态，可能遭遇的孤独、缺乏安全感等心理危机和滋生暴力、犯罪行为的潜在风险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②为了解决家庭看护难题，保障学生福祉，政府积极推动建立面向学龄儿童的正规专门性课后服务机构。1979年，新加坡儿童协会响应号召，创建了第一家学生关爱中心，首批接收20位“挂钥匙儿童”。此后关爱中心在全国陆续设立，由新加坡社会和家庭发展部(Ministry of Social and Family Development, 简称MSF)监管，致力于为更多有需要的7—14岁学龄儿童提供一个安全和有组织的课后环境。

20世纪70年代末，新加坡由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马来族裔因受教育程度低和经济相对贫困而被边缘化的危机加剧。^③因此，课后服务政策呈现出向少数族裔倾斜、注重学术成绩的特征。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基于“走向优异”的教育目标，新加坡逐步推行全日制学校。部分学校优先为弱势儿童群体开设了课余托管计划，让学生在教师监督下完成功课、进修艺体类课程以及补差。^④

总的来说，兴起阶段的课后服务以“基础保障”“底线保障”为思路，逐步缓解困扰家庭和社会的“三点半现象”，保障了学龄儿童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健康和福祉。但是此阶段课后服务的内容形式相对单一，学校作用尚未充分体现。

2. 完善阶段(20世纪90年代至今)：以全人教育为特色，强调全面覆盖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新加坡更加重视学习、教育、创新。新加坡政府于20世纪90年代末提

出“思考型学校，学习型国家”(Thinking Schools, Learning Nation)的愿景，着力培养具有创新思维能力和终身学习热情的年轻人。^⑤新加坡课后服务的内涵进一步深化，积极倡导全人教育(Holistic Education)理念。1999年，新加坡将课外活动(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更名为课程辅助活动(Co-Curricular Activities, 简称CCA)，要求各学校放学后开设多样化的非学术类活动供学生自主选择。CCA旨在帮助学生发现自己的兴趣和才能，培养正确的价值观、社会情感能力和重要技能，增进来自不同背景的学生之间的交往。^⑥2010年，新加坡颁布21世纪素养框架，CCA被视为学校学习经验的核心组成部分。^⑦新加坡教育部(Ministry Of Education, 简称MOE)建议小学生每周参与CCA的时间为2—3小时，建议中学生和预科生5—6小时，从而有效保障了所有学生在放学后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利，不因家庭经济资本差距而失去全面发展的机会。

课后服务体系的完善还体现在MOE和MSF两大行政部门由独立实施走向整合推进，提高课后服务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在小学阶段，MOE携手MSF大力普及校本关爱中心，2020年实现了185所小学全覆盖的目标。^⑧在中学阶段，MOE从2014年开始试点推行中学课后服务项目，包括建立课后休闲中心、提供有针对性的指导以及参加非学术课程的机会。^⑨2018年，新加坡成立提升学生生活和激励家庭工作组(Uplifting Pupils in Life and Inspiring Families Task Force, 简称UP-

① Long, J. Thomas, Lynnette Long, "What Is Meant by Latchkey Children", *Current Topics i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Vol. 5, no. 5 (2000), p. 141.

② Ho, Lai-Yun, "Raising Children in Singapore: A Paediatrician's Perspective", *Ann Acad Med Singapore*, no. 38 (2009), p. 158.

③ Charlene Tan, "Narrowing the Gap: the Educational Achievements of the Malay Community in Singapore", *Intercultural Education*, Vol. 18, no. 1 (2007), p. 53.

④ 胡庆芳：《新加坡普通教育面向21世纪的适应性改革与发展》，《外国中小学教育》1999年第4期，第14—18页。

⑤ 丁瑞常，康云非：《新加坡教育制度与政策研究》，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127页。

⑥ 檀慧玲等：《新加坡文化教育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22年版，第257页。

⑦ 师曼，周平艳，陈有义等：《新加坡21世纪素养教育的学校实践》，《人民教育》2016年第20期，第68—74页。

⑧ MOE: School-based Student Care Centres, 载新加坡教育部官网：<https://www.moe.gov.sg/primary/p1-registration/student-care-centres>, 最后登录日期：2023年6月25日。

⑨ Jolene Ang, Parliament: 60 more Secondary Schools to Offer After-school Care Programmes, 载 <https://www.straitstimes.com/singapore/education/60-more-secondary-schools-to-offer-after-school-care-programmes>, 最后登录日期：2023年6月25日。

LIFT),超过50家组织参与其中。^①针对厌学和辍学青少年持续增加的现象,MOE和MSF发起UPLIFT社区试点项目,制定课后服务方案帮助学生重拾学习热情^②,同时招募家庭益友志愿者配对支持相关家庭。^③2019年,MSF主导实施社区联系站(ComLink)计划^④,鼓励社区合作伙伴和志愿者为有需要的家庭提供课后教育、父母辅导等综合服务。^⑤

完善阶段,新加坡学校课后服务发展迅速,福利部门和教育部门的配合更加紧密,课后服务的参与率和认可度逐渐提高。经过多年的探索,新加坡以面向全体、关注个体的方式形成了兼具服务和教育功能的课后服务体系。

二、新加坡课后服务的实践特征

1. 供给主体多元化

新加坡课后服务体系建立在所有利益相关者对教育的共同理解和集体行动的基础之上,形成了政府主导、学校支持、家社合作的工作机制。

(1)政府:主导者

新加坡课后服务体现了自上而下的政府集权管理。一是制定政策,规定课后服务的提供者、服务原则、内容形式等,加强课后服务资源优化配置。二是经费支撑,无论是公益性关爱中心还是学校,CCA都得到了政府财政经费扶持。政府还为弱势群体提供课后看护费用补贴。^⑥三是盘活

政府各部门的资源,丰富课后服务供给。例如,MOE与中央禁毒局共建课后参与方案,为中小學生提供防毒反毒教育。^⑦四是监管和评估,由MSF和MOE履行课后服务的监督职责,保障课后服务的公益性和高质量。

(2)学校:直接责任者

学校在场、师资等方面拥有优势,具备良好的社会信任基础,是提供课后服务的主阵地,具体表现在:一是提供校本化CCA活动课程。自1999年起,MOE将学校推为CCA的首要执行主体,享有充分的自主权开发和实施CCA子项目。CCA也被纳入学校办学的考核指标体系。^⑧二是灵活开展课后项目,例如为有需要的学生提供课后补差,并及时转介课后服务资源。学校还为校本关爱中心提供物理空间和设施支持。三是积极推动“学校-家庭-社区”三位一体的教育网络。各学校陆续成立家长教师协会、家长支持小组等家校共育组织。学校、家长和更广泛的社区之间的伙伴关系不断强化。^⑨

(3)社会力量:长期协作者

在新加坡,包括公共机构、自助团体、社会服务机构、志愿者团体、商业机构在内的社会力量广泛参与课后服务。一是运营学生关爱中心。以自助团体和社会服务机构为代表的非营利性组织在社区运营了最早一批社本关爱中心,并且因其志愿机制而带来的对公共利益的维护、长期积累的

^① MOE:Expansion of UPLIFT Initiatives,载新加坡教育部官网:<https://www.moe.gov.sg/news/press-releases/20211110-expansion-of-uplift-initiatives>,最后登录日期:2023年7月25日。

^② MOE:Students Who Drop out of Secondary School after Completion of Primary School Education,载新加坡教育部官网:<https://www.moe.gov.sg/news/parliamentary-replies/20160815-students-who-drop-out-of-secondary-school-after-completion-of-primary-school-education>,最后登录日期:2023年7月25日。

^③ MSF:Social Service Offices (SSOs),载新加坡社会和家庭发展部官网:<https://www.msf.gov.sg/what-we-do/volunteer/find-causes/social-service-offices>,最后登录日期:2023年6月25日。

^④ MSF:ComLink,载新加坡社会和家庭发展部官网:<https://www.msf.gov.sg/what-we-do/volunteer/find-causes/comlink>,最后登录日期:2023年7月25日。

^⑤ Feng Zengkun,Primary 6 Pupil Overcomes Fear of Maths with Support from Volunteers and Initiatives,载<https://www.business-times.com.sg/esg/primary-6-pupil-overcomes-fear-maths-support-volunteers-and-initiatives>,最后登录日期:2023年7月25日。

^⑥ MSF:Student Care,载新加坡社会和家庭发展部官网:<https://www.msf.gov.sg/what-we-do/student-care/home>,最后登录日期:2023年7月25日。

^⑦ CNB:After-School Engagement Programme,载新加坡中央禁毒局官网:<https://www.cnb.gov.sg/educational-resources/core-programmes/after-school-engagement-programme>,最后登录日期:2023年6月25日。

^⑧ 杨素萍,高慧艳:《新加坡中学课程辅助活动及其对我国的启示》,《当代教育科学》2019年第12期,第85-91页。

^⑨ MOE:Forward Singapore: New Partnerships, New Perspectives,载新加坡教育部官网:<https://www.moe.gov.sg/news/press-releases/20221119-forward-singapore-new-partnerships-new-perspectives>,最后登录日期:2023年7月25日。

托管经验以及较低的运作成本,成为政府新建校本关爱中心的主要合作方。但是,新加坡大部分的关爱中心是由商业机构运营,提供的课后服务往往更为灵活丰富,便于满足家庭差异化的需求,同时家长也通常需要承担更高的费用。二是以多方合作的方式,为弱势群体提供援助性质的课后服务。例如,华业集团通过 UPLIFT 社区项目为居住在出租公寓的近 60 名小学生提供攀岩、陶艺等免费课后活动。^①

2. 服务内容多样化

课后服务在新加坡既是一项公共教育福利,也是全人教育发展的必要补充。以需求为导向,关爱中心主要针对需要看护的低龄学生,提供有偿服务;而 CCA 则面向所有青少年的成长,由学校开展免费的课后活动。基于这两大品牌,新加坡打造了集看护辅导与教育发展为一体的丰富内容,有效地促进了学生学习能力、兴趣爱好、身体健康、社会情感等方面整全发展。

(1) 看护辅导服务

新加坡以校本关爱中心为主流、社本关爱中心为补充的课后托管模式日趋完善。关爱中心提供的看护辅导服务呈现以下三个方面的特点:一是空间与时间的连续,学生放学后直接从课堂进入关爱中心,有效避免了脱管、脱离、脱节问题;二是课内与课外的互补,关爱中心灵活提供学业支持类、品德养成类、户外和室内运动类、文娱类活动,还在假期组织研学活动,这些课外体验与学科内容形成有益的互补;三是看护辅导区别于“影子教育”,关爱中心以环境安全、家长安心和学生安康为目标,服务侧重于发展儿童人格、培养良好的习惯和社会情感能力。

作为民生的托底服务,新加坡课后托管以全纳性为原则,除了面向普通学生的关爱中心,还设有 8 家由 MSF 委任的特教学生关爱中心,专门为 7—18 岁在校残障学生提供课后教育支持以及独立生活的社会技能和生活技能培训。

(2) 全面发展服务

新加坡学校独具特色的 CCA 制度是课后服务发挥育人功能的主要载体。从顶层设计来看,CCA 以四大类进阶式活动覆盖全体学生,这四类活动分别是体育运动、视觉及表演艺术、俱乐部和社团活动、制服团体活动。丰富的体育项目致力于培养健康的青少年;视觉及表演艺术与新加坡重视多民族文化遗产的传统密切相关;俱乐部和社团活动主要发展学生多方面的兴趣和创造力;制服团体活动则是培养学生国家荣誉感、领导力的重要途径。同时引入了面向中学生课外活动的评价制度,重点评估学生在“参与、服务、领导力、成就”四个范畴的等级表现,并与升学挂钩。从校本设置来看,各学校对内结合校本特色与学生需求,对外引入社区资源,因地制宜开发四大类活动的子项目,并且积极对接国内外专项赛事,为学生展示成果搭建平台。从微观实践来看,CCA 活动基于儿童兴趣的多样性和生活经验的情境性进行组织,横向融合课内外教育教学资源,纵向贯通青少年身心成长。

基于“扶优”政策,新加坡还开设资优生项目,将课堂教学和课后服务一体推进,例如面向小学生的高能力学生丰富项目、资优教育项目、少年体育学院项目,以及面向中学生的艺术类、人文类、语言类、音乐类 4 个项目,通过个性化菜单和精细化辅导促进学生卓越发展。

3. 师资培养差异化

课后服务教师既包括课后服务机构的专兼职工作人员,也包括提供 CCA 活动的教师、校外教练和指导员。新加坡对两类师资强调人本理念下的差异化培养。

(1) 从业标准与职前培训

MOE 从参与度、胜任力两个方面确保学校教师在课后服务中发挥积极作用。一是规定中小学每位教师根据自身的兴趣和经验,至少参与辅导一项 CCA 子项目。二是教师在入职前都必须接受专业的师范教育,“为孩子提供优质的课程辅助活动(意识)”^②被列入能力框架考察范围。对于

^① Goh Yan Han, Free Enrichment Activities under Community Uplift Scheme for Children in Jurong West Rental Flats, 载 <https://www.straittimes.com/singapore/children-living-in-jurong-west-rental-flats-get-free-enrichment-classes-under-community-uplift-scheme>, 最后登录日期:2023年7月25日。

^② NIE. GTC(Graduand Teacher Competencies)Framework, 载 https://www.nie.edu.sg/docs/default-source/td_practicum/te21-gtc.pdf, 最后登录日期:2023年5月21日。

校外教练和指导员的专业能力有严格要求,所有教练和指导员都要定期注册,才有资格进入各学校组织的招募环节和入职培训。

课后服务机构的师资人员由各关爱中心自行负责招募。2019年,MSF 出台《学生关爱中心指南》,明确了人员配置和任职标准。

(2) 队伍建设与职后发展

关爱中心的人员需求多样,从业标准也相对宽松,这样最大限度解决了托管服务人员短缺的问题,但也引发了家长对师资质量的质疑与担忧。近年来,新加坡以规范化管理为核心,加强关爱中心师资力量。一是多方合作开展资格认证培训。^①二是各关爱中心通过例会制度、内部培训、主管评估等方式,促进师资人员的职业发展。三是强调反思实践,鼓励教师在自我学习、自我反思以及实践训练中积累经验。

CCA 师资培养则注重与教师专业化发展、学校特色化办学相结合。一是纳入教师专业发展培养计划。政府规定每位在职中小学教师每年最少完成 100 小时的培训,可以从 1000 多种课程中自行选择,培训内容涵盖课后服务等领域。二是打造专业学习共同体。中小学教师 in CCA 中扮演着学习引导者、课程设计者、在岗研修者、沟通对接者、活动管理者等多重角色^②,建立教师合作文化有利于推进 CCA 的设计和 implementation。三是面向 CCA 校外教练开展专业分类、全面提升的在岗培训,完善待遇保障制度。

三、新加坡课后服务对我国践行“双减”政策的启示

1. 完善政府主导、多元协同的育人机制

我国课后服务由最初强调“发挥学校课后育人主渠道作用”^③到“拓展课后服务渠道”^④,体现了以学校为中心、多主体参与课后服务的实践取向。借鉴新加坡经验,要明确课后服务的价值功

能,明晰相关主体的职责,在政府主导下形成优势互补、责任共担的良好局面。

首先,政府制定和完善课后服务的标准,支持学校建立课后服务资源调配平台。加大对课后服务的投入,尤其是注重优先保障弱势群体的课后服务权益。其次,学校将课后服务纳入整体教育规划之中,统筹安排好教育教学和课后服务的协同。再次,吸纳社会力量,要注重因地因校制宜。可以与社会公益组织共建办学,学校提供场地,社会公益组织实行代管代教;也可以与非学科类培训机构协商办学;还可以请所在地的高校、图书馆等单位委托办学,提供公益性、有特色的课后服务。最后,要合理引导家长对课后服务的预期,鼓励家长参与课后服务,提升家校社育人合力。

2. 推进课后服务课程化建设

参考 CCA 制度,可通过课后服务课程化建设以及注重与其他课程的有机融合,向学生提供全人教育,有望促使我国课后服务从有效落实走向提质育人。

首先,要立足需求,整体规划课程体系。着眼于提升学生核心素养和促进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打造涵盖学业巩固、学科拓展、综合实践、素质提升等丰富内容的课后服务课程体系,推动课后服务与课堂教学双向赋能。其次,要鼓励学校结合自身优势和地区资源,打造课后服务的专长项目和特色课程。学校要多渠道整合校内外资源,加大体育、美育、社团、劳动实践等活动占比,给学生更多的课后选择。要遵循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和教育教学规律,进行多类别、进阶式的设计和 implementation。最后,聚焦质量提升,开展基于证据的综合评估。

3. 优化课后服务师资队伍

我国可以借鉴新加坡课后服务的准入制度和培训制度,优化课后服务师资队伍。

首先,要激活中小学教师参与课后服务的内

^① Steps Taken to Ensure Quality, Affordable, Student Care, 载 <https://www.straittimes.com/forum/letters-in-print/steps-taken-to-ensure-quality-affordable-student-care>, 最后登录日期:2023年5月21日。

^② 贾燕菲:《新加坡课程辅助活动教师角色分析》,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1年,第I页。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教育部办公厅做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载教育部官网:http://www.moe.gov.cn/srcsite/A06/s3325/201703/t20170304_298203.html, 最后登录日期:2023年6月25日。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载教育部官网:http://www.moe.gov.cn/jyb_xxgk/moe_1777/moe_1778/202107/t20210724_546576.html, 最后登录日期:2023年6月22日。

生动力,提高其课后服务水平。对于我国中小学教师而言,课后服务尚属于一个新增的工作领域,也是一项有别于课堂教学的育人活动,因此,需要为教师合理“减负”、及时“充电”。要从教师职业发展出发,鼓励教师结合自身专业、兴趣、特长,积极探索课堂教学与课后服务整合实施的途径,将教师在课后服务方面的贡献与创新纳入绩效评价

与职称评定。其次,要厘清课后服务从业人员的类别,完善相应的准入制度。坚持“人岗匹配”原则,依据校外教员、管理人员、安全员等不同岗位,制订任职标准和招募方案。再次,要以制度化设计支持课外校外师资队伍有序发展,加强专业技能培训。最后,要注重课后服务师资储备,将课后服务环节纳入师范生教育见习与实习机制。

The Integration of Serving and Educational Functions: Study on After-school Services in Singapore

ZHANG huizhi

(School of Education,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Abstract: Over the past half century, Singapore has formed its after-school services system that emphasizes both serving and educational functions. Based on two major brands of Student Care Centre(SCC) and Co-Curricular Activities(CCA), the system is characterized by pluralistic-supplied subjects, diversified contents and forms, as well as differentiated faculty training. Singapore's experience provides enlightenment for the reform in China under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including improving the government-oriented and multivariate-cooperated education system, promoting curriculum-based after-school services, and optimizing the teaching staff.

Key words: after-school services, Singapore's experienc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